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郭希鹏助傅作义重创日寇 铁骑如虹

本报记者 刘宇 魏秀葵 隋春波 崔薇薇 郇澜澜



王友禄向记者介绍《盖平县志》中有关郭希鹏的内容。



郭洪新与记者来到郭希鹏故居。



郭洪新向记者介绍郭希鹏故居情况。

Table with 10 columns: 服役履历, 出身, 族名, 名姓, 籍贯, 学历, 职务, 荣誉, 其他, 备注. Lists military service and personal details of Gao Hisheng.

张恺新提供的郭希鹏军官佐履历表。

Table with 2 columns: 姓名, 职务. Lists names and positions of officers associated with Gao Hisheng.

记者在西安事变纪念馆里的东北军将领序列表中看到郭希鹏的名字。

引言

很多营口人去过沈阳，但没去过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它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老龙口酒厂附近。狭长院落内，青砖碧瓦，古树参天。记者前往之时，正值朱仲，槐树花开，香气弥漫。参观完毕，经过树下，静谧的空气中忽然掠过一股气流，无数小巧洁白的槐花扑簌竟相坠落，形成一阵“槐花雨”。雨点掉落在头上，鼻尖上，仿佛在提醒记者：别忘了讲武堂里的营口故人……

“在我们这儿，说起‘郭希鹏’这个名字，大伙儿会觉得陌生；但如果提到‘鼎九’这个字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营口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盖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友禄是盖州市暖泉镇方屯村人。2018年，他在网络上搜索盖州老照片时，看到一篇当地抗日将领郭鼎九生平简介的文章，“鼎九”二字吸引了他的目光。“难道郭鼎九就是郭希鹏？”通过细致走访调查，王友禄最终确认了自己的猜测。王友禄告诉记者，方屯村一带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之为“十八锅鼎”。传说，古时有人在这座山上埋藏了九鼎、十八锅金子。方屯人祖祖辈辈有一句俗语：“九鼎十八锅，不是前坡就是后坡。”抗日战争时期，侵占该地区的日本鬼子听闻这一传说，专门出动专家上山进行探测，前坡后被探测个遍，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王友禄小时候听曾祖母讲，民国时期，方屯村上堡子老郭家出过一位师长叫郭鼎九，非常有名望。郭希鹏的故居就在十八锅鼎南坡下的村落里，他的字号“鼎九”，即取自“九鼎十八锅”这一俗语。

热爱历史文化研究的王友禄由此萌生了进一步了解郭希鹏的想法。但由于年代久远，了解其生平的人大多去世，直系后人早已迁离盖州。他只能通过寻访当地郭氏后人及上岁数的老住户等方式，努力还原出这位抗日将领的辉煌过往。

渐露锋芒

郭希鹏（1890—1969），原名锡朋，字寿山，号鼎九，辽宁盖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东北军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在热河、冀东等地领导抗日斗争。1935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率部参加多次战役。1936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37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38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39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40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41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42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43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44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45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46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47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48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49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50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51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52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53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54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55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56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57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58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59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60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61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62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63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64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65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66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67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1968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师长。1969年，任东北军骑兵第四旅旅长。

郭希鹏自幼读书，高小毕业后入盖平县读中学，后听从父亲建议，考入奉天政法学校，又考入军事学校学习骑兵技术，后编入奉军。张作霖重建东北陆军讲武堂后，郭希鹏任第一期学员教官。据陈列馆中的史料记载，东北陆军讲武堂大体分两个时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晚清重臣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时创办奉天讲武堂，调训各道防营的在职军官，只办了一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钦差大臣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将奉天讲武堂改为东三省讲武堂，分陆军和边防两个班，调训陆军各旗和边防防营的在职军官。至宣统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停办。第二个时期是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时，为整顿军队，培养中、高级军官，于民国八年（1919年）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东北军第一所自办军事学校。1927年，张学良改称其东北陆军讲武堂。至九一八事变前，共办了11期，培养学员1万多人。

讲武堂下设四个区队，分步、骑、炮、工、辐五个兵种，郭希鹏为骑兵中队区队长。第一期222名入堂学习的在职军官中，张学良是其中之一。当了三年教官后，郭希鹏又回到部队任营长。1922年，他取得去日本留学深造的机会，就读日本千叶骑兵学校，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

1925年郭希鹏回国，担任奉军骑兵第八旅二团团长、第五师骑八旅旅长。1926年夏，冯玉祥率国民军入关奉、奉天大战，国民军战败，郭希鹏兼任察西镇守使兼骑兵第十五师师长。同年9月，奉天大战。1927年秋，奉天占领辽远后，郭希鹏升任绥远都统，将原奉军骑五旅改编为奉军第三十旅，绥西护路队改编为奉军第三十二旅。1928年3月兼任晋北警备司令。年底东北易帜，郭希鹏改任东北军骑兵第一旅旅长，驻军热河。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编入国

民革命军第一序列旅团番号之内，郭希鹏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骑兵旅第四旅旅长，驻军通辽。近日，营口市历史学者阎海通过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编辑部副主任张世新，获得一份郭希鹏的《军佐履历表》（复印件），上面有其家庭情况简要介绍：1928年，郭希鹏时年38岁，妻子名韩氏，子郭铁成时年3岁。九一八事变之后，郭希鹏即随东北军撤入关内。热河失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张学良通电下野，东北军进行改编。1933年3月，骑兵第四旅改为骑兵第四师，郭希鹏任师长。1935年，国民政府对军作进行修订，4月起，陆续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授衔。继1名陆海空军特级上将、8名陆军一级上将、20名陆军二级上将之后，郭希鹏位列89名陆军中将之一。

1935年8月，郭希鹏任骑兵第三师师长，驻甘肃平凉。

明升暗降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侵占东北地区后，于1932年3月1日扶植起一个傀儡伪政权“满洲国”，又于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妄图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以实现其“满蒙计划”，控制绥远，构成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蒙古军政府”于嘉卜寺（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古称）成立，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将化德县改为“额尔德木索雅图勒浩特”（汉名德化市）。同年11月初，日军驻嘉卜寺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古军和大汉奸王英“大汉义军”总兵力1.7万人，在日军数架飞机支援下，分四路企图攻占绥远。

郭希鹏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进行坚决斗争。13日，日伪先头部队与中国守军在红格勒日（今察哈尔附近）发生前哨战。15日，日伪军在飞机、大炮、装甲车掩护下，向守军阵地猛烈进攻，守军奋勇抵抗。晚6时，敌军被击退。18日，傅作义部毙敌1000余人，取得红格勒图保卫战胜利。

失败后的日伪军企图固守百灵庙（今包公附近）。24日，傅作义挥师北上，经过激烈战斗，成功收复百灵庙，毙敌1700余人，取得百灵庙战役胜利。

12月10日，傅作义继续进攻，收复锡拉木伦古（今乌兰察布西北附近），毙日军顾问20余人，“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绥远抗战时期，郭希鹏率军准备进入绥远，协助傅作义的部队抗日。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作家、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所著《杨虎城大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7日接受中共建议，宣布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在日内尔中被迫瓦解。郭希鹏收到张学良命令，继续在甘肃留守，管辖兰州到西安的公路。蒋介石则用明升暗降的方式，让郭希鹏担任没有实权的骑兵第二副军长。

白手起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骑兵第二军回师山西的第二战区管轄，该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中损失惨重。据曾任绥远骑兵司令部少将总参谋的李宗颖在《郭希鹏组军抗战纪实》一文中国忆，当时郭希鹏所能指挥的官兵，包括副官李荣春一共不过十几个人。没有实际的空手副官长无法有所作为，郭希鹏决定，自己招兵买马，组织一支抗日军队打击敌人，壮大实力，收复失地。

他策李荣春到山西西北隅的老营堡招募，那里当时有很多溃败下来的官兵。李荣春去后，很快招聚了5000人，整编为3个团，郭希鹏任命许殿双、郭希鹏等为团长，进行严格训练。不久他又发觉，这些溃兵普遍存在恐日心理。只有先打几次胜仗，才能提高士气。

群众的”抗战理念表示认同，允许中共在其辖区内开展抗日宣传（如成立“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吸纳部分进步青年（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加入其部队从事政治工作。

10月，傅作义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负责忻口右翼防御，与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形成配合——八路军在敌后袭扰日军交通线，支援傅作义正面防御。傅作义对八路军的战术予以肯定，曾对部下说：“八路军的游击战打得好，值得我们学习。”

1938年初，傅作义的北路军司令部驻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时，毛泽东派曾三、程子华与其会谈合作抗日事宜。随后，傅作义派周北峰去延安谒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其巩固部队。此后，八路军第二一〇师、山西战地总会在晋西北动员了3700多名青年加入傅作义部队，增强了其战斗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他借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强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同年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但傅作义仍保持与中共的有限接触。

1939年，傅作义在绥西推行“新政”，包括减租减息、组织农会等，与中共在敌后的政策部分契合。

中共对郭希鹏部的支持也不遗余力。《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史》第一卷中写道：“1939年4月，傅作义部队的郭希鹏二军、王煦坤骑六师、朱子察哈尔游击军从河套开往绥远敌占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给予积极协助。在日伪军发动‘五月大扫荡’时，八路军与郭希鹏部联合行动，反击日伪军扫荡，八路军中部队带领和掩护郭希鹏突围，并为其收留溃散官兵数百人，助其重整旗鼓继续抗日。”

1940年五原战役期间（五原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傅作义部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李井泉部）达成默契：八路军袭扰日军后方交通，牵制其增援部队，为傅作义部收复五原创造条件。这种“敌后配合正面”的协作，虽未形成正式协议，但加深了双方的军事互信。

通过亲身经历，傅作义认识到中共“真心抗日”的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实效，逐渐改变了对中共的偏见。这种认知，为1949年他选择与中共合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埋下关键伏笔。

早期接触

中国共产党与傅作义的早期接触，始于民族危机加深之际，主要围绕抗日救亡主题展开，历经从义武支持到军事协作的演进。

作为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将领，傅作义长期驻守绥远、华北等地，对日本侵华野心有直接体会。中共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张，积极争取国民党的爱国力量，两者的早期互动，根植于“抵御外侮”的共同诉求。

傅作义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以战止战”。中共则通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将傅作义等视为“可争取的中间力量”。

1936年11月24日百灵庙大捷次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称赞傅作义“发起抗战”的行动“支持表示默许”。傅作义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高度评价傅作义“组织援绥联军”的倡议。毛泽东、朱德等联名向傅作义发出贺电称，“孤军无后，迭获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欢腾”，明确表达“愿作后盾”的立场。

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派地下党员南汉宸（与傅作义旧识）通过间接渠道与其沟通，传递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傅作义未公开回应，但对中共的支持表示默许。他在绥远抗战期间，未阻挡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率部在察北战场作战，与八路军产生直接军事协作，接触进一步深入：9月，周恩来、彭德怀等先后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与傅作义多次交谈，使他对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同年秋，中共派南汉宸（时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负责人）赴傅作义部，双方就“抗日合作”交换意见。傅作义对中共“动员民众、依靠



中国骑兵部队（资料图片）。



郭希鹏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时的照片。



位于辽宁沈阳的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

代理骑兵第九师少将师长。其他如副军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师师长及两个师的副师长等重要职位，均由胡宗南的嫡系出任。后来不到3个月，李荣春也被撤换。

1943年9月，胡宗南请调郭希鹏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派嫡系接任骑兵第三军军长职务。就这样，郭希鹏亲手创立的这支抗日军队，被胡宗南整个心掉。

郭希鹏失去了实权，胡宗南还是不甘心，1944年，他让郭希鹏到陆军大学将官深造，使之彻底离开部队。

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派郭希鹏到东北汇报中将高参。郭希鹏拒绝参与内战，1948年1月因病为由正式退役，在北平（今北京）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郭希鹏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在北京开办利华消火泡沫厂任副厂长。公私合营后，郭希鹏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发言说：“郭希鹏同志在绥远抗战中的功绩，不应被历史遗忘。”这一发言内容被收录于《傅作义文集》（1994年版）。

脱离军界

五原战役后，郭希鹏继续追击敌人，向东进入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不久，奉命改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胡宗南电调郭希鹏到陕西陇西县整训。路过西安时，郭希鹏去见胡宗南，胡宗南说：“你在绥察抗战，劳苦功高，我要把你送骑兵司令部改编为骑兵兵。由你负责整训，保卫陕西，不用再再到敌后打游击了。”胡宗南电请国民党军参事委员会、国民政府任命郭希鹏为骑兵第三军中队长，辖第九师、第十一师两个骑兵团，一个独立骑兵团。经郭希鹏力保，李荣春为

故土情深

王友禄撰写的《从盖州走出的抗日名将——郭希鹏将军》一文介绍，当地居民郭书礼的父亲郭希普是郭希鹏堂兄。据郭书礼回忆，1964年，郭希鹏回过一次家乡，乘坐的是盖平县（今盖州市）政府派来一辆吉普车。待驶过腰岭东的大清河（当时没有桥），进入暖泉地界时，郭希鹏下了车，告诉随行人员，他不想坐碾轧家乡的土地，他要与故土亲密接触，用双脚走回家。就这样，郭希鹏从前暖泉村走向方屯村。进村后，郭希鹏受到当时暖泉人民公社领导的热情欢迎。随后，他到自



郭希鹏（AI创作）。

己的故居看了看。此时的老宅早已不是昔日风光显赫的郭家大院。看着祖辈世代居住，自己出生、长大的故居，郭希鹏感慨万千。告别故居，郭希鹏来到堂兄郭希普家叙旧，并在他家吃晚饭过夜，次日离开家乡。

这一历史情节，得到暖泉原乡党委书记王崇鹏的认证。当年，他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任暖泉人民公社组织委员，“以我当时的身量，根本没机会近距离接触郭希鹏，只能远远望着。”

可惜，这次离开，竟是郭希鹏与家乡的永别。1969年，郭希鹏在沈阳去世，享年79岁。

2025年7月12日，记者在方屯村村干部郭洪新的带领下，来到郭希鹏故居。院落正房屋檐下，悬挂着辽宁省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盖州市历史建筑 方屯村郭希鹏故居”牌匾。上面介绍说：“郭希鹏是一位骁勇善战，‘以我当时的身份，根本没机会近距离接触郭希鹏，只能远远望着。’”

记者了解到，郭希鹏故居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原为四合院，由正房、东西偏房、门房、院墙、影壁墙组成。原房主为木架硬山式建筑，墙基由花岗岩条石砌筑，主体由青砖砌筑，屋顶为灰瓦覆盖。木质古式接空雕花方格门窗，房屋前后山墙外沿共有8块雕花以吉祥图案的砖雕窗棂。

经王友禄引荐，记者与郭希鹏的孙子郭洪鑫取得了联系。今年48岁的他定居北京，每年都到位于沈阳的回龙岗革命烈士公墓为爷爷扫墓。郭洪鑫说，爷爷过世时他还未出生，父亲在其年幼时也已离世，因此，他对爷爷的生平事迹了解并不多。令他感动的是，虽然爷爷已离世多年，但当地百姓并没有忘记他。“2018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关于爷爷事迹的文章，作者是王友禄，于是主动留言联系到他。”从那时起，两个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最早”

最早代表全民族发出武装抗日的怒吼

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至1932年4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十份宣言、决议、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爱国党派、团体和民众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最早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提出愿意在“保证民众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在‘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红军愿与蒋携手共同救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主张。9月22日，国共两党共同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最早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单纯依靠军队和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则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1937年7月8日，中共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最广泛动员和组织敌后游击战，最大限度团结和发动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民族战争路线。这条战争路线以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彻底解放为最高利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迫切要求。

最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大举举兵展开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1937年9月，为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命令第一一五师进行平型关伏击战。1937年9月，晋察冀边区军政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战和华北敌后抗战起到“坚强堡垒”的作用。

最早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独立团、骑兵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共3000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区抗日根据地。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选举产生了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坚持中国共产党抗战和华北敌后抗战起到“坚强堡垒”的作用。

最早指明抗日战争的道路、前途和命运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内流行着“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倾向。为坚定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信心，消除国际友人的疑虑，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战实际，集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全面、系统、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支持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以及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三大问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明了中国抗战的进程和方向。

最早吹响全面反攻号角

1945年，中国战场的全面反攻拉开序幕。由于抗战后期蒋介石采取军事收缩战略，主力退在西南大后方，因此中国战场的全面反攻，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1945年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要求解放区各部队展开全面反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

从1945年8月9日开始的全面反攻作战，中国解放区军民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下期预告

绥远抗战的胜利，打出了中国军民的不屈精神和顽强勇气，一扫之前弥漫国内的亡国论阴霾，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绥远请缨抗战书》，其想法由“苦战”“突围”向“兵谏”转变，另一位营口籍抗战英雄高福源恰于此际出现。



扫码观看《铁骑如虹》。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营口烽火 抗战记忆”